

《哈佛看中国——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专家访谈活动》之马丁·怀特教授访谈稿件

中国经济转型的社会学解读

——访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马丁·怀特

马丁·K·怀特教授简介

马丁·K·怀特 (Martin King Whyte), 中文名字怀默霆, 现任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是已故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威廉·F·怀特 (William Foote Whyte) 之子; 1994 年与妻子 Alice Hogan 从中国收养义女 Julia。



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怀默霆教授 怀默霆教授与妻子 Alice Hogan、女儿 Julia 在桂林漓江

马丁·怀特于 1971 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先后在密西根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 比较社会学、家庭社会学、发展社会学、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对后共产主义转型的社会学研究等。马丁·怀特教授是美国哈佛大学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专家和当今国际学术界研究中国问题的知名学者, 对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和分析是他教学和研究中关注的重点, 在哈佛大学, 马丁·怀特教授给本科生讲授《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给研究生讲授《不平等、社会分层与当代中国社会》等中国问题研究课程。长期以来,

他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与社会模式、中国婚嫁与家庭模式、中国城市家庭的延续与变革、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与生育权、中国社会制度变迁背景下的男女不平等、中国家庭内部代际关系与老年人口、中国经济增长与社会不平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马丁·K·怀特教授近年来主要作品目录

1、专著《社会火山之误解：当代中国对不平等和分配不公的认知》(*Myth of the Social Volcano: Perceptions of Inequality and Distributive Injusti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即将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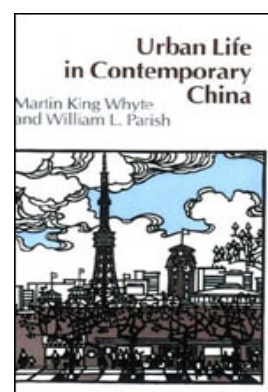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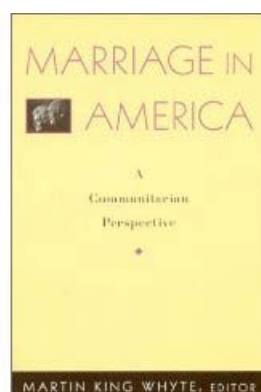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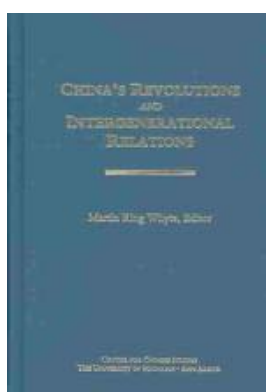
2、主编《一个国家、两种社会：中国的城乡差别》(*One Country, Two Societies: Rural-Urban Inequality in China*), 哈佛大学出版社, 2009 年出版 (印刷中)。

3、主编《中国革命与代际关系》(*China's Revolutions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密西根大学出版社, 2003 年出版。

4、合编《中国：改变过去，直面未来》(*China: Adapting the Past, Confronting the Future*), 密西根大学出版社, 2002 年出版。

5、主编《美国社会的婚姻：社群主义的视角》(*Marriage in America: A Communitarian Perspective*), Rowman and Littlefield 出版公司, 2000 年出版。

6、与白威廉 (William Parish) 合著《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84 年出版。



怀默霆教授的部分代表作

7、专著《工业社会前的妇女地位》(*The Status of Women in Preindustrial Societies*),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78 年出版。

8、与白威廉 (William Parish) 合著《当代中国的村庄与家庭》(*Village and Family in Contemporary China*),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78 年出版。

9、专著《中国的政治学习小组与政治仪式》(*Small Groups and Political Rituals in China*),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74 年出版。

10、论文《中国公民希望政府在促进平等方面有更多作为吗?》(Do Chinese Citizens Want the Government to Do More to Promote Equality?), 载于 P·格里斯(P. Gries) 与 S·罗森 (S. Rosen) 主编《21 世纪中国的国家与社会》(*State and Society in 21st Century China*), 纽约劳特利奇出版公司 (Routledge), 即将出版。

11、论文《对中国平等与不平等问题的再思考》(Rethinking Equality and Inequality in the PRC), 载于 R·麦克法夸尔 (R. MacFarquhar) 主编《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China: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哈佛大学出版社, 即将出版。

12、论文《中国民众如何看待当前的社会不平等》(Views of Chinese Citizens on Current Inequalities), 载于《社会学研究》(中文杂志, *Sociological Research*), 2009 年第 1 期。

13、论文《中国经济增长的悖论》(Paradoxes of China's Economic Boom),

载于《社会学年度评论》(*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9 年第 35 期。

14、论文《大众对分配不公的看法：北京与华沙的比较》(*Popular Attitudes toward Distributive Justice: Beijing and Warsaw Compared*)(与韩春萍合作), 载于《中国政治学刊》(*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008 年第 13 期。

15、论文《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生活的延续与变迁》(*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Urban Chinese Family Life*), 载于《中国学刊》(*The China Journal*), 2005 年 1 月。

16、论文《中国的家族和经济发展：阻力还是动力？》(*Chinese famili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bstacle or engine?*), 载于李新春、张书军主编《家族企业：组织、行为与中国经济》(*Family enterprises: organization, behavior, and the Chinese economy*),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出版；该文英文版发表于 1996 年《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7、论文《中国家庭的子女义务：现代化的悖论》(*Filial Obligations in Chinese Families: Paradoxes of Modernization*), 载于 Charlotte Ikels 主编《孝道：当代东亚的实践与话语》(*Filial Piety: Practice and Discourse in Contemporary East Asia*),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2004 年出版。

18、论文《中国社会的不平等与社会分层》(*Inequality and Stratification in Chinese Society*), 载于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Market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年出版；该文英文版发表于 1975 年《美国社会学评论》(*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论文《中国城市：从包办婚姻到自由恋爱》(*From Arranged Marriages to*

Love Matches in Urban China), 鞞 伊庆春 (Chin-chun Yi) 主编《婚姻关系的形成与破裂 :东西方的不同视角》(*Marriage Formation and Dissolution; Perspectives from East and West*), 台北中央研究院 (Academia Sinica), 1995 年出版。

20、论文《成都的婚礼行为与家庭策略》(Wedding Behavior and Family Strategies in Chengdu), 鞞 D·戴维斯 (D. Davis) 与 S·哈勒尔 (S. Harrell) 主编《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家庭》(*Chinese Families in the Post-Mao Era*),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93 年出版。

王洛忠个人简介

王洛忠, 男, 汉族, 山东临沂人, 管理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访问学者 (2009 年 1 月——2010 年 1 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分析、行政体制改革, 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北京市“十一五”社科规划项目等课题; 在《中国行政管理》、《理论前沿》、《新视野》等学术期刊发表专业论文近 20 篇; 为本科生、研究生讲授《行政管理学》、《公共政策分析》、《人力资源管理法律基础》等课程。曾荣获北京师范大学“优秀辅导员”(2005 年)、第十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一等奖 (2006 年)、学生工作先进个人 (2008)、励耘优秀青年教师奖 (2008 年) 等校级奖励和荣誉称号; 荣获北京市高校优秀辅导员(2006 年)、第五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文史组一等奖(2007 年)、北京市“教育创新标兵”(2008 年) 等市级奖励和荣誉称号。

采访札记

2009年6月22日,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丁·怀特先生应邀接受了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王洛忠博士的访谈。整个访谈持续了两个半小时,话题涉及马丁·怀特教授的治学历程及与中国学生、学者的合作,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及其对家庭、社会结构的影响,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与社会不公平等问题。访谈结束后,王洛忠博士又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等形式与马丁·怀特教授进行了多次交流。以下的访谈记录经过马丁·怀特教授的修改,并征得了他的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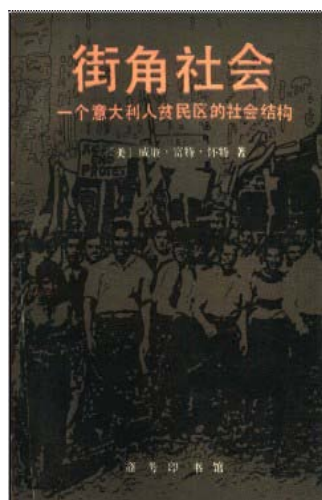


2009年6月22日,怀默霆教授在其办公室接受了北师大王洛忠副教授的访谈

王洛忠: 马丁·怀特教授您好! 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哈佛学者看中国》项目组的访谈。我知道您是哈佛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社会学专家, 来之前我不止一次看过您的个人简历, 获悉您本科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物理学专业, 博士毕业于哈佛大学社会学专业, 现在从事社会学研究与教学工作。可是物理学与社会学离得太远了, 您是怎么从物理学转到社会学的? 又是怎么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感兴趣的?

马丁·怀特: 谈到我的专业方向与研究兴趣, 不能不提到我的父亲威廉·F·怀

特先生，他是美国非常有名的社会学家，他的代表作《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Street Corner Society: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n Italian Slum*)，英文版最早出版于 1943 年，后来经过多次再版，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出版，其中包括中文版本。我的父亲于 1936 至 1940 年，使用“参与式观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 对波士顿北区 (Boston's North End) 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科纳维尔”(Cornerville) 进行实地研究。他以被研究群体——“街角帮”(Street Gangs) 一员的身份，对闲荡于街头巷尾的意大利裔青年的生活状况、组织结构以及他们的人际关系加以观察，从中得出关于该社区社会结构及相互作用方式的重要结论。在中产阶级看来，科纳维尔是一个犯罪频仍、贫困滋生、政客腐败、一团乱麻的危险地带，可我父亲经过长期实地观察，在这里却发现了高度组织化的、完整的社会制度。研究方法与研究结论使得《街角社会》成为美国社会学研究的经典之作。尽管我父亲是一位有名的社会学家，可青年时代的我却并不想从事社会学的学习和研究，因为我们多数美国人都不想“子承父业”。



怀默霆教授的父亲威廉·怀特
教授的代表作《街角社会》

我成长于 20 世纪 50 年代，正处于美苏争霸的关键时期。当时前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 (Sputnik)，美国人感到很震惊，认为前苏联的太空技术已经超过美国。作为当时的爱国青年，我数学等科目的成绩比较好，所以进了康奈尔大学物理学系，那时候我的理想是当一名科学家，帮助美国赶超苏联。但是由于美国当时实行通识教育 (Liberal Arts System)，开设的物理学专业课仅占总学

时的 1/4 左右，学物理专业也要修历史、外语等课程，所以我就开始学俄语了，并开始对前苏联的研究感兴趣，修读了苏联历史、文学和政治等相关课程。1964-65 年，我申请到当时的哈佛大学苏联研究中心（也就是现在的 Davis Center），攻读苏联问题研究方面的硕士。尽管我不是苏联赫鲁晓夫（Khrushchev）的崇拜者，但我知道他和中国的毛泽东、邓小平一样，是一个大人物，他批评斯大林，发动了非斯大林化运动（The Anti-Stalin Campaign），力推外交、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改革，想把苏联建设成一个更加平等、更加美好的社会。对我学术生涯发展非常有影响的是：1964 年正当我刚开始研究苏联问题、开始攻读该领域硕士的时候，赫鲁晓夫被解除了一切职务，勃列日涅夫（Brezhnev）上台了。我不太喜欢勃列日涅夫这个人，觉得他进取心不强，这直接影响到我对前苏联的研究兴趣。

1965-66 年，我在攻读苏联问题研究的硕士学位时，了解到哈佛大学还开设有关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一些课程，我想知道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到底有什么区别，因为毛泽东说过中国的社会主义不仅要区别于美国的资本主义，而且要区别于苏俄的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开始学习汉语和与中国有关的课程；与此同时，毛泽东批判苏联是修正主义（Revisionist）在中国开始发动文化大革命，我觉得这有些不可思议，更加激发了我研究中国问题的兴趣。

但在当时的哈佛大学，研究苏联问题和中国问题都只能获得硕士学位，不可能获得博士学位；而我自己的兴趣又想当教授，从事学术研究。在此情况下，我开始攻读社会学的博士学位，因为社会学是社会科学领域中研究内容最为宽泛的学科，而且社会学的研究与我先前进行的苏联问题研究、中国问题研究可以很好

的结合起来，更好地理解不同社会制度的差异。所以最终我还是进入了我父亲的研究领域——社会学。我的博士论文最终选定研究中国问题，题目是《中国的政治学习小组与政治仪式》(*Small Groups and Political Rituals in China.*)，并于1974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

王洛忠：看来您个人的兴趣、父亲的影响，以及美苏关系、苏联与中国的变革等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您的专业选择。您刚才谈到，您的父亲使用“参与式观察”等方法，研究意大利贫民区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您研究中国问题，到中国去做实证调研的机会多吗？

马丁·怀特：社会学是非常重视实证研究方法的。研究中国问题，当然应该到中国去做实证调研。尽管我的博士论文选择研究中国问题，但那个时候却没有美国人能够到中国去。我没有办法，只好绕道去香港。那个时候，我每隔3——4年就要去香港呆一年。记得1968-69、1973-74、1977-78年，我分别在香港住了三年，做我的课题调研工作。我对那些曾经居住在中国大陆、后来移居到香港的中国人进行深度访谈，谈他们在中国大陆曾经住过的地方、他们曾经上过的学校、他们的家庭和周围的邻居等。我把这些移居香港的大陆人当作是“潜望镜”(Periscope)，通过他们去间接了解中国大陆的实际情况。

我第一次真正到中国大陆，是1973年，通过参加“学术代表团”的方式去的。由于那时中国还没有推行改革开放，对我们外国代表团控制得很严，我们只去了5个地方考察。那时候尽管中国已经购买了波音飞机，但我们却不能直接飞往北京或上海，我们乘坐火车到了深圳。那时的深圳还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城市，周围都是稻田。从香港过桥到深圳，完全判若两个世界：深圳没有闪烁的霓虹灯、

高耸的大楼，也没有任何的夜生活。但是改革开放 30 年以后，今天再从香港去深圳，没有人能够觉出深圳与香港有什么区别！

王洛忠：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以及中美关系的日益密切，现在您去中国方便多了吧？是不是和中国社会学界同仁的合作也越来越多了？

马丁·怀特：没错。在 1973 年我首次访问中国之前，我只能绕道香港间接了解中国；1952 年，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取消了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设置，我那时根本就不敢奢望能够和中国学术界的朋友进行科研方面的合作；即使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到中国大陆做实地调研也是比较难的。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在密西根大学任教时，研究美国的家庭社会学。我在底特律地区对已婚妇女进行实地调研，研究他们的恋爱方式、婚姻关系及对婚后生活的影响等。我当时对中国从“包办婚姻”(Arranged marriage) 到“自由恋爱”(Free-choice marriage) 的转变非常感兴趣，就想到中国去调研，但当时还不太容易啊。1978-79 年，费孝通先生访问美国，我就认识他了；1985 年，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当时根本没有电子邮件！)，告诉他我想去中国做实地调研；费孝通先生给我回信说为时尚早，不太方便。后来，密西根州与中国的四川省结成友好关系，我认识了四川大学的朋友。尽管 1977 年中国的社会学开始恢复重建，但 1985 年的时候四川大学还没有建成独立的社会学系，社会学当时设在哲学系里。我在美国筹得调研经费后，在四川大学袁亚宇、徐晓鹤等人的支持下，最终于 1987 年完成了在成都地区的调研。这是我和中国大陆学界同仁的首次合作！

王洛忠：万事开头难嘛！是不是现在与中国学界的同仁合作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容易了？

马丁·怀特：是的。在和四川大学首次合作之后，近几年和北京大学的合作比较频繁。1994年，我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杨善华教授、中国老龄化问题研究中心的肖振宇教授合作，在河北保定就中国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进行实地调研，研究成果集中体现为《中国革命与代际关系》(*China's Revolutions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一书。后来，我又和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的沈明明教授合作，开始从事中国社会不平等问题的调查和研究。我在密西根大学任教时，是沈明明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他也算是我的学生了。沈明明1994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北京大学创办了中国国情研究中心(The Research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hina, RCCCCPKU)。1999年前后，我开始关注并研究中国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及民众的反应。我和沈明明教授联系，2000年先在北京地区就民众对社会不平等的态度与反应做了预调查(Pilot Survey)，进展非常顺利；2004年又在全国范围内做了更大规模的抽样调查。最近这几年，我和我的同事、学生一直忙于2004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的整理和分析，我们发表了几篇关于中国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文章，我们的专著《社会火山之误解：当代中国对不平等和财富分配不公的认知》(*Myth of the Social Volcano: Perceptions of Inequality and Distributions Injusti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即将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个月我又去了北京，与沈明明教授、杨明教授等合作伙伴商讨进行五年之后的



怀默霆教授与杨善华教授(右)、陈杰明教授

(左)在北京全聚德烤鸭店

跟踪调查 (Follow-up Survey)

王洛忠：在您教学与科研过程中，您不仅与中国学者进行了密切合作，应该也指导过不少来自中国的学生吧？

马丁·怀特：是的，我在密西根大学任教时，就指导过几个中国学生。我与四川大学最初的合作者徐晓鹤后来成了我的学生，他在密西根州立大学获得社会学硕士后，回四川大学教了几年书，后来又回到密西根大学跟着我读博士，现在德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 (University of Texas at San Antonio) 任教。参与我和沈明明教授关于中国社会不平等问题合作调研的王丰与陈杰明也都是我的学生，王丰现在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Irvine) 社会学系的系主任；陈杰明是德克萨斯农机大学金斯维尔分校 (Texas A&M University at Kingsville) 社会学系的系主任。参与河北保定关于中国家庭内部代际关系调研的郝洪生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现就职于华盛顿地区的一家统计公司 Westat，他是一个抽样专家。我在哈佛大学指导的第一个学生是胡晓江，她现在你们北京师范大学工作，是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的教授。她实际上是我的老师——傅高义 (Erza Vogel) 先生的学生，后来傅高义先生退休了，由我来指导她。我上个月在北京还见到她，她下学期要来肯尼迪政府学院做访问学者。另一名学生刘东晓是我和哈佛大学政府系的蒂达·斯卡普 (Theda Skocpol) 教授联合指导的，她现在任教于德克萨斯农机大学主校区 (Texas A&M University)；韩春萍今年 9 月份将成为德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的副教授。现在在读的博士生还有来自中国的郭茂灿和安卫华；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杨典与周敏正在撰写他们的博士论文。当然，还有来自香港特区和台湾的学生。在我指导

的学生中，中国学生占了大多数，但不都是中国学生，还有来自加拿大、德国和美国的学生，他们也从事中国问题的研究。

王洛忠：谢谢您这么详细地介绍您与中国学者、学生的合作关系。下面，让我们转向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等问题。众所周知，去年 2008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今年 2009 年我们将庆祝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回顾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周年所走过的不平凡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您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是怎么看待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快速发展的？

马丁·怀特：应该承认，中国自 1978 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功 (Extraordinary successes)。尽管 1989 年六四以后遭遇西方制裁和 1997 年经历亚洲金融危机，中国仍然保持了连续 30 年年均 10% 的增长速度；数亿农村人口摆脱了贫困，富足的中产阶级正在崛起，民众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76 年毛泽东去世时外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微不足道，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资最大的接受者；中国从刚建国时外汇储备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几乎为零，发展到拥有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 (2008 年接近 2 万亿)；1958 年“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超英赶美让人啼笑皆非，可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中国真就成为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1973 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中国人穿的衣服从颜色到款式非常单一、土气，今天中国生产的物美价廉、时尚新潮的服装销售到世界各地；1976 年中国没有私家车，费孝通他们用的都是单位的公车，现在中国一年的汽车销售量超过 900 万辆，中国人购买别克轿车 (Buicks) 的数量都超过了美国人；近年来中国摩天

大厦、高速公路、购物商场、豪华旅馆的大幅增加，还有其他一些在视觉上随处可以捕捉到的片断，无不展示出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来所取得的辉煌成果——中国正变得越来越现代化和富足。不但西方社会没有预料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系会从高度集权、效率极低的计划经济成功转型到现代市场经济，而且连 1978 年中国改革的设计者可能都没有想到中国经济改革会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当然，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负面的东西，比如环境污染问题、能源浪费等问题；作为一个社会学家，近几年来我一直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城乡差距（The rural-urban gap）。哈佛大学出版社今年年底要出版我和我的朋友主编的一本会议论文集《一个国家两种社会：当代中国的城乡不平等》（*One Country, Two Societies: Rural-urban Inequ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中国社会城乡差异的问题由来已久，而且差距越来越大。在毛泽东的时代，中国就建立了所谓的户籍制度，把农村人口束缚在农村的土地上；确定了城市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长期以来忽视农业发展和农民利益。在我个人看来，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是产生城乡差距的根源，导致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一生中的权利和机会都存在巨大差异，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可是直到现在，户籍制度依然存在，而且还在发挥作用。当然，近年来也出现了户籍制度松动的呼声与试点，农村人口可以离开自己的土地，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可以去乡镇企业打工，可以进城市当农民工，也可以自己经营生意；但是，这一切仅是些微改革，没有触及到根本的户籍制度结构，因为不管你走到哪里，你仍然是农业户口，你都是外地来的，你在就业、医疗、社保、购房、子女入学等很多方面，不能享受和城里人同样的待遇。尽管今天城市建设和城市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农民工的贡献，农民工仍然不能够被公平对待。我想这是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来没有解决的社会问题，也是影响

中国今后发展的大问题。但不管怎么样，中国近 30 年来的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成果堪称“中国奇迹”！

王洛忠：您刚才谈到，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年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接近 10%；我最近读了一篇文章，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七个国家（地区）曾经以 7% 以上的年增长率持续增长超过 30 年，中国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其中最大的经济体。不仅如此，中国还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平稳转型，没有出现其他转型国家那样的剧烈经济和政治波动。在您看来，导致“中国奇迹”出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马丁·怀特：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不但取得了连续 30 年 GDP 年均 9.8% 的增长率，而且成功避免了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的政治风波，应该说，中国创造了创造经济增长和体制转型的“双奇迹”！我想这与中国所选择的渐进式变革的道路和策略有关。

在西方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到底该怎样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争论由来已久，简单来讲，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到底该采取渐进变革（The gradualist approach）还是激进变革（The big bang approach or shock therapy）的方式？曾任教于哈佛大学的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Janos Kornai）强烈建议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走激进变革的道路，他的建议还得到了世界银行等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认同。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偏偏采用了渐进变革的方式。科尔内等人批评渐进改革有两个问题：继续发挥作用的计划经济会用错误信息干扰企业和市场的理性决策，从而使计划经济的副作用抵消了市场经济的高效率；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长期并轨运转会增加官员寻租和谋求暴利的腐败机会，所以他才主张激进变

革的路线。东欧一些国家听取了科尔内等人的建议，伴随着共产党政权的垮台，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走上了激进变革的道路，结果由于政治混乱、政权解体和政府软弱，反而不能有力地推动市场化改革；而中国则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只有走渐进变革的道路。尽管在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确实出现了官员寻租和腐败等问题，但未必比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严重。由于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推动改革的决心与策略，中国的渐进式变革反而取得了巨大成功，庆幸中国领导人没有听从经济学专家所提出的激进变革的建议。

王洛忠：谢谢您的观点。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讨论，学界也有从传统文化角度进行分析的，认为中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吃苦耐劳，儒家文化有自己的优势，等等。您认同这种观点吗？

马丁·怀特：我不认可这种观点，或者说至少不完全认可这种观点，有的人还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经济发展的障碍呢。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把中国作为经济发展失败的案例加以研究。尽管 18 世纪以前中国在很多方面要比西方社会发达，但工业革命却最早发生在英国，这被视作是中国发展的第一次失败；19 世纪到 20 世纪初，中国和日本都面临英国等西方国家军事与经济挑战，但日本通过改革增强了国力，迎接了挑战，变成了现代工业国家，中国在此过程中第二次失败了。一个历经两次重大失败的国家为什么现在如此成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过去的两次失败、又是什么原因带来了这次的成功？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用“文化缺陷论”（Culture deficiency framework）的观点进行了权威解释。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同于西方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过于崇尚稳定与和谐，不主张变革，不鼓励自治，不推崇商业自利，强调家庭义务超过理性计算……中

国传统文化的缺陷导致它不能孕育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埃尔文(Mark Elvin) 提出“高水平均衡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 的解释——传统社会后期，中国人口的高度增长很容易满足工业革命所需要的替代力需求，这种立刻实现的高水平均衡反而成为中国无法进入工业革命的陷阱。至于中国的第二次失败，也有人从文化的角度作出解释：Robert Bellah 认为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经过改革，具有和新教伦理相似的功能，很多武士后来都转变成了商人和企业家；而中国因缺乏相应的文化基础而不能形成企业家阶层。Marion Levy 认为日本之所以取得成功，原因在于日本视家庭竞争力的重要性超越血缘亲属关系——日本家庭的财产要由最有竞争力的孩子独自继承；为了确保家庭竞争力，甚至可以由收养的孩子来继承，这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家庭理念中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近年来对“文化缺陷论”的批评不绝于耳：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经济发展活力最足、速度最快的地区就是大中华地区(台湾、香港、新加坡和今天的大陆) 或者儒家文化圈(日本、韩国和越南)，这使得文化缺陷论让人难以信服，于是有人就修改了自己的观点，把过去用来解释中国经济发展障碍的文化因素重新解释成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当然，也有人认为是 1840——1949 年中国政府的软弱、无能和贪腐，以及长期的政治混乱、外敌入侵和各种战争，再加上 1949——1978 年的政策失误，耽误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个观点似乎比“文化缺陷论”更有道理，所以我不完全认同文化视角的分析。

王洛忠：就是嘛！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不但有文化沙文主义之嫌，而且本身就是大而化之的偷懒之作。中国人从来就是勤劳的，历史上如此，现在如此，计划经济时代也如此，但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无论如

何也不能称为奇迹。在讨论中国近 30 年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也有人将其概括为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 (State-directed economic development)，并对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缺陷表示担忧，您怎么看待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府作用？

马丁·怀特 :纵观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中国经济增长，确实离不开政府的作用，将之概括为“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也是比较准确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确实怀疑这种增长模式的有效性，很多人批评这种增长模式可能存在很多风险：一是有可能出现掠夺型政府 (A predatory state)；二是政府与企业关系过于密切，会产生裙带资本主义 (Crony capitalism)；三是即使政府有发展经济的良好意图，但结果却出现决策失误、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负面问题，中国的“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就是典型的例子。就中国而言，还有人担心在一个由受教育水平较低、但政治忠诚度较高的职业党棍 (Apparatchiks)组成的政治体系中，很难平衡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但我的疑问是：尽管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自上而下 (Top-down)、政府驱动的，尽管中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干预力度是很大的，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仍然取得了成功？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腾飞正是借助于政府的政策职能与干预作用：在经济发展层面，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学习苏联模式；但到 80 年代，就发现完全的计划经济行不通，于是学习东亚，引入“雁行发展模式”(Flying geese approach)，从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向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这是政府对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更为重要的是，在政治与行政改革层面，中国政府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一是党委和政府人事管理的变化，实行官员强制性退休，腾出大量位置给受过良好教育、掌握专业技能的年轻人，中国很快就完成了从“德治 (Virtuocracy)”到“功绩制 (Meritocracy)”的转变，在毛泽东时代禁止对官员使用的物质激励 (Material incentive)被重新

应用，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官员在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高绩效就会获得物质奖励；二是行政管理与财政管理两个层面，实行“市场维护型分权”(Market-preserving Decentralization)，下放国有企业的管理权限，财政上实行分灶吃饭，减轻企业的社会化负担，推行企业产权私有化，借助市场竞争机制大大激发了地方政府与企业的积极性。与日本的通产省体制或韩国政府支持大财团的做法相比，中国经济发展对政府的依赖还算是小的，最初主要依靠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等，政府的作用主要是进行行政改革以减少管制障碍、建立制度规则以确保市场秩序、鼓励市场竞争以促进经济发展。不可回避，在中国经济起飞的过程中，中国政府一直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在此过程中，也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腐败、裙带资本主义等问题，但邓小平及其继任者应用政府的权力主要是去培育市场、形成竞争、实施激励、促进发展，而不是靠选择与扶持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优势企业去推动经济发展。

王洛忠：国内外一个流行的观点是，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构成对主流经济学及其衍生政策、特别是华盛顿共识 (Washington consensus) 的挑战。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 (Joshua Cooper Ramo) 甚至提出了“北京共识”的概念；后来，为避免与华盛顿共识的反冲，中国学术界用“中国模式”的概念取代了“北京共识”。您认同“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的提法吗？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对于全球范围内的发展模式研究有何贡献？

马丁·怀特：对于“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的讨论，我看到很多，但我不是经济学家，我不想做过多评论。我认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巨大成功对于学术界研究普遍意义上的发展模式是有贡献的，它确实有力地驳斥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一

些关于经济发展的思维定势与错误结论。

比如，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合理的制度安排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到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和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都强调合理的制度安排对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到底什么是合理的制度安排呢？在西方，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非常推崇“华盛顿共识”的建议，其中特别强调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制度。可是，拉美许多国家采用了“华盛顿共识”的制度安排后却出现了经济绩效的倒退；中国采纳了“华盛顿共识”的部分建议，如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放松对外资的限制等，但并没有采纳私有产权保护这一核心建议。在中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从1994年开始中央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30年不变，看上去有尊重和保护产权的意思，但地方官员和农民都不愿执行中央政府的这一规定；而且近几年地方官员为了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纷纷将集体土地承包出去，变成了建设用地和工业用地，所以农民对土地的产权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在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但企业等可以长期租赁；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允许发展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1994年以后才开始国有企业的半民营化(Quasi- privatization)；2007年宪法修正案才明确宣布保护私有财产；只有部分股票允许自由流通，外资进入股市仍然受限，因此，城市中的私有产权仍然受到严格限制。可问题在于：中国的制度安排、特别是私有产权保护不尽合理，那为什么还能取得经济的高增长呢？我的解释是：首先，中国改革的方向是越来越尊重并保护私有产权，而不是回归过去曾经出现过的重新国有化(Renationalization)；其次，中国市场上丰厚利润的诱惑使得投资者认为在产权方面的冒险是值得的；最后，即使中国的产权界定不够明晰、制度安排不尽合理，但与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相比，情况好

转了很多，为市场主体提供的激励也足够多。在中国市场上如果没有足够的竞争机会与利润激励，即使有私有产权的保护，也难以引导市场主体去努力工作、大胆创新、敢于冒险。所以，这种“次优方案的效用 (Utility of suboptimal solutions)”说明私有产权保护制度本身对中国经济增长并非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认为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功案例表明，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战略与制度体系；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未必能取得成功；与其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不如客观分析本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在此基础上量体裁衣，选择适合本国的发展政策与制度。

王洛忠：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您怎么看待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对家庭、单位等社会结构的影响？

马丁·怀特：因为我研究发展社会学和家庭社会学，自然会关注中国改革开放对家庭、婚姻等社会关系的影响。刚才我提到，1987 年我和四川大学首次合作调研，关注的就是中国从包办婚姻到自由恋爱的变化。我们在成都访谈不同年龄段的妇女，问她们是怎么认识自己的丈夫的，是父母包办、别人介绍还是自由恋爱？恋爱方式对她们婚后生活有什么影响？我们发现，通过自由恋爱而结婚的妇女，婚后家庭关系都相对和谐，生活比较幸福；我们更重要的发现是：中国婚姻家庭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社会主义改造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对年轻人的婚姻选择和家庭关系有重要影响，相反，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及其提出的口号、标语等，对中国家庭结构、社会关系的影响反而不如想象得那么大。

1994 年，我和北京大学的杨善华教授等人合作，在河北保定就中国家庭内

的代际关系问题进行调研。当时学术界有很多人讨论中国的改革开放所导致的社会与文化变迁问题，很多人的观点是改革开放以后，年轻人的价值理念变了，他们不再那么尊敬长者，年轻人与老人之间的代际冲突越来越严重。我们在保定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对老年人和他们的成年子女进行访谈，结果发现问题并不像很多学者所认为得那样。调查结果显示：年轻人确实与父母在生活经历、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等方面有差异，他们对音乐、电影、书籍等，都有和父母不同的爱好。当问到从社会普遍情况看，年轻人对长者是不是越来越不尊敬了？他们回答说是；但当问及他们自己孩子是否也不太尊敬他们，受访者并不接受这样的说法，他们认为自己与孩子之间的代际关系处理得还可以。在当时，父母不需要子女尽太多的赡养义务，因为当时城市里退休老人都有退休金，都住在单位分的房子里，也有的和子女住在一起，帮子女带孩子；作为回报，子女也经常来看父母，带父母去看病、旅游，等等。总体上讲，家庭内的代际关系还是很融洽的。当然，我们没有去农村调研，听说农村的情况不太好，农村的子女大多外出打工，父母就担心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如果儿子大了要结婚了，父母又没有钱为他们盖新房子，父母本人就要搬出去，将自己的房子让给儿子娶媳妇用。在这种情况下，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际冲突可能要多一些，不过我们没有去农村调研，具体情况不是特别了解。我们研究社会学是经验主义倾向的，我们要靠事实和数据说话，没有调查，我不敢轻易下结论，更不能主观臆想。

王洛忠：您刚才谈到，最近这几年您一直潜心研究中国社会的不平等问题，这确实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大问题。根据中国社科院 2006 年《社会蓝皮书》发布的数据，中国 2004 年基尼系数 (Gini Coefficient) 为 0.53，比

1984 年的基尼系数扩大了 1 倍，已经超过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许多学者认为：民众对社会不公平的不满不断积聚，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的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您 2004 年的全国问卷调查结论是这样吗？您发现中国民众是怎样认识中国当前不平等的现状和趋势的？是感谢改革带来的机会从而心存乐观，还是对不平等和不公平的不断扩大而心有不满？

马丁·怀特：我发现中国的很多问题都被夸大其词了。没错，中国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确实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两级分化，在中国经济腾飞的过程中，我们确实看到了身家动辄百万的企业巨头、戒备森严的私人别墅；同时也看到了上百万的城市失业人员和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特权财富的重新出现在中国是客观存在的。但对于普通中国民众而言，他们对中国社会不平等的看法并不像某些学者所描述得那么突出和严重。我和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的沈明明教授等人合作，于 2004 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调研，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大部分中国人认为全国范围内的不平等程度过大；但大部分人并不认为周边环境（Local）里的不平等程度过大。在回答“当前全国范围内的收入差距是太大了、有些大、正好、有些小还是太小了”这一问题时，71.7%的受访者认为当前全国范围内的收入差距有些过大；然而，当我们继续问他们自己单位内以及所住社区内的收入差距时，认为这些周边环境里的收入差距过大的受访者所占比例大为减少，分别只有 39.6%和 31.8%。同时，当问及“在 5 年后中国穷人以及富人的比例是会上升、不变，还是会下降”时，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穷人的比例会下降，而富人的比例会上升。可见主导性的看法还是很乐观的，民众认同经济发展会令所有人受益，尽管受益的程度和速度上存在差异。

调查得出的第二个结论显示 ,中国民众认为导致贫富差距最主要的原因是个人绩效 (Individual merit) , 而非社会不公平 (Social injustice)。我们采用“国际社会公正调查”(International Social Justice Project, ISJP)中的相关问题 ,询问是什么因素导致贫富差距 ,我们列出的因素包括个人绩效 (比如个人能力才干、教育程度、勤奋与否等)



怀默霆教授与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
的合作团队在商讨调研事务

和外部的结构性因素 (比如经济体制不公平、机会不均等、社会上存在歧视等)。在被问到是什么因素导致人们成为穷人的时候 ,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缺乏能力和才干、学历太低以及个人努力不够 ;在被问到是什么因素促使目前有些人成为富人时 ,虽然排列的次序稍有不同 ,但是排在最前的依然是这三个因素 :有能力和才干、工作勤奋和高学历。而不诚实、社会偏见和歧视、经济体制不公平等因素 ,则在解释为什么有些人贫困而另一些人富有的时候被排在了最末端。可见 ,中国大部分民众认为导致贫富分化的最主要原因仍然是个人绩效 , 而不是社会不公平。

而且 , 我们还把 2004 年中国调查所得数据与“国际社会公正调查”对东欧转型社会的俄罗斯、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以及属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国调研的数据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 :与上述国家相比 ,认为中国全国范围内收入差距过大的比例并不大 ,只有美国民众的比例与中国相当 ,匈牙

利和保加利亚的数据 (95%) 远超过中国 (71.7%); 在参与调查的所有国家中 , 认为未来 5 年内穷人比例会上升的中国受访者是最少的 , 认为富人比例会上升的中国受访者是最多的 ; 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受访者更可能用结构性因素来解释导致贫富差距的原因 , 即使与三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 , 中国受访者强调个人绩效因素的比例也是最高的。由此可见 , 尽管中国受访者对当前社会某些方面的不平等确有微词 , 但是他们总体上仍倾向于认为 , 目前产生各种社会不平等的资源分配模式是比较公平的 , 中国民众对当前的收入差距和不平等的程度是可以接受的。

王洛忠 : 尽管调查结果显示多数中国人认为当前的社会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 , 您个人判断中国民众的不满情绪短期内不会积聚成为威胁政治稳定的“社会火山”(Social volcano), 但我们必须知微见著、居安思危 , 增强忧患意识。假如中国正在变成一座“社会火山”, 您认为首先爆发者会是那些社会弱势群体吗? 学术界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农民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心存怨愤的 , 您的研究结论与这些通常看法一致吗?

马丁·怀特 : 这个问题问得好 ! 诚如你所说的 , 许多分析人士甚至政府官员都认为 , 农民和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处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 , 在市场化改革中被远远抛于世后 , 他们的利益被市场化的措施所损害 , 他们最有可能对中国现存的不平等心存怨怒。然而 , 我们的调查结果却表明 , 上述通常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 , 或者说不准确的。

在我们的研究中 , 我们使用一系列变量来研究什么因素决定中国民众对当前不平等的态度 , 这些变量包括受访者的客观职业和户口类别、人口和社会经济特

征、地区差异、主观地位和认知等。我们通过考察每个自变量在线性回归模型中的标准回归系数 beta (Standardized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得出以下结论：从受访者客观职业和户口类别看，农村居民受访者，特别是农民，显著地比城市居民更不可能认为全国范围内的收入差距过大，更不可能觉得当前的不平等对社会稳定有害，更不可能赞成结构性因素是造成人们成为穷人或是富人的原因；从受访者年龄、民族、学历、家庭收入等人口和社会经济特征看，并非优势地位群体会对不平等更加接受，因为受过更多教育的人更有可能对社会不平等提出批评，汉族比少数民族更倾向于认为全国范围内的收入差距过大，中年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不平等有害且不公平；从地区差异看，我们并没有在中西部地区、远离城市的地区、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发现更多的对当前不平等的的不满者；从主观变量看，那些认为他们的家庭生活水平 5 年来有所提高的人，和那些认为自己比身边的人具有更高社会地位的人，更少地批评当前的不平等，而那些在过去 3 年里有着与不平等相关的“糟糕的经历”的人，则更可能抱有批评的态度。

如此看来，在我们的数据中，只有主观变量支持通常的看法，其他变量都反复证明：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弱势群体可能对社会不平等更加接受，而优势群体则更容易对之产生不满；农村居民、农民工和下岗职工未必会因心怀不满而成为“社会火山”的引发者。

王洛忠：您的调研结论与通常看法完全不一样啊！您如何解释“弱势群体未必会对当前的不平等心怀不满”这一结论？您的研究结论对中国今后的改革与发展又有着怎样的政策含义？

马丁·怀特：我想主观变量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农村居民会比城市居民更

容易接受当前的不平等。尽管农民处于中国社会的底层，改革开放仍然为他们带来了许多在计划经济时期所没有的新的机会。他们不再是人民公社时期的“社会主义的农奴”(Socialist serfdom)。在某种意义上，市场化改革把农民从计划经济时期的严格控制中解放了出来，使得他们的生活不可能变得更差，而只有可能更好 (Nowhere to go but up)。由于改革开放的退行和市场经济的引入，农民现在不只种粮食，他们还可以种经济作物，进农村的工厂或施工队，到城市去打工，自己做生意，等等。虽然通向这些机会的途径本身会导致更大的不平等，但是由于农民关于不平等的态度更可能是基于和周围的人比较，而不是与那些远在都市里的富豪比较，他们并不一定会意识到这一点，这也许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会比我们通常以为的更加乐观。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我并不是要暗示说，中国的农民没有产生不满的基础，而是说，他们的不满并不主要地来自于当前的不平等是否过度以及是否公平。事实上，近年来激发农民抗议的更多



应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邀请，怀默霍教授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就中国社会不平等问题做专题演讲

的是程序上的不公正 (Procedural injustice)，而不是分配上的不公正 (Distributive injustice)。例如，直到 2006 年才废除的农村不公平的税费负担；农民想让周边的工厂停止环境污染但却无能为力；以及农村征地没有和农民进行充分地协商，没有给农民足够的补偿，等等。

主观因素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城市居民会对不平等更具有批评性。虽然城市

中有更多的优势——致富的机会比农村更多，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也比农村提高得更快，但是城市居民也会面对诸如破产、失业、社会福利减少、收入下降等问题。这让他们跟农民不一样，他们不会有“没什么可失去，只有可能向上流动”的感觉。除了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的国企改革让很多人丢掉了“铁饭碗”之外，城市居民还直接见证了市场经济改革的风险，也看到了许多新出现的暴富阶层以及他们奢侈的生活方式。一方面是自己在改革中的痛苦挣扎，另一方面是一些走入他们视野的迅速变富的人——这一切使得他们并不能通过和农民相比而得到安慰。在这一意义上，虽然跟过去和身边的人相比，使得农民对当前的不平等更容易接受，而这样的比较在另一方面却也有可能使得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心怀不满。

我们认为关于中国民众如何看待不平等的通常看法过于简单，大部分甚至是错误的。事实上，总体而言，中国民众对当前的不平等更多地是接受而不是不满；而最为不满的那些人也并不集中于中国最底层的弱势群体。这些结论的政策含义就在于：民众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并不一定能代表他们对社会不平等的主观态度，而仅仅知道基尼系数或其他一些衡量收入分配的指标，也未必就能预测社会大众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当前不平等的现状和趋势是社会稳定而不是社会不稳定的来源。这一结论并不意味着中国领导人可以松一口气，忽视中国民众、特别是那些弱势群体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但是，它确实表明，未来关于不平等趋势的政策判断，应该基于对大众态度的扎实可靠的研究而不是建立在未经检验的假设上，理所当然地就认为基尼系数的上升、或者家庭收入的下降等会自然而然地导致人们对当前社会制度及分配方式的不满。

王洛忠：综合考虑 2004 年全国调研所得出的结论，您觉得中国要解决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不平等问题，治理对策及其切入点是什么呢？

马丁·怀特：首先，我要说的是，作为美国的社会学家，我对自己的定位和要求不同于中国的社会学家。你们总是要提出实用性的对策建议，但我们只需要客观准确地理解现实问题就行了，未必要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

谈到中国的社会不平等、特别是城乡不平等的问题，它与中国的户籍制度密切相关。给我的印象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包括政府官员在内，都认为现行户籍制度是不公平的。在 2004 年的全国调查中，我们也有几个问题与中国户籍制度有关，如“您认为农民工不能把孩子送到城市的学校读书公平吗？”、“农民工不能受雇于城市中的某些工作公平吗？”、“农民工不能享受城市的社会福利待遇公平吗？”等等。绝大多数的受访者，包括拥有城镇户口的城市居民，都觉得这些规定不公平。因此，现在遭受批评和质疑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中国的户籍制度。当然，一下子取消户籍制度的限制也不可能，很多人担心这会导致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而城市的空间、资源和福利项目又相对稀缺，也必然引起城市秩序的混乱；但是，中国必须逐步放松对户籍制度的限制。我看到已经有这方面的很多政策建议，也有一些地方政府与城市正在试点户籍制度改革。

当然，中国在打破身份界限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现在市场化的劳动用工机制已经基本确立，根据你的学历和工作经验，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人力资源；过去则是根据出身地位和政治表现进行计划分配，而且一旦分配完了你就要在那个岗位上安心工作，不能随意调动。现在这种面向市场、允许流动的劳动用工制度给了人们更多的选择机会，激发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在社会公平方面也是一大进步。但在社会公平方面中国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

大形势下，中国必须想办法确保经济的持续增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力争实现公平就业。

王洛忠：最后一个问题，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您未来的研究计划？

马丁·怀特：好的。刚才我谈到，我们正考虑在今年年底到中国做一个五年后的跟踪调查。我们想知道五年之后，特别是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民众对社会不平等的态度又有哪些新的变化。这项跟踪研究可能又要花费我五年左右的时间，那我就快退休啦！我上个月去中国，感觉到北京和上海的变化太大了。事实上，中国每个地方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让世人叹为观止的巨大变化！中国是充满活力、充满希望的一方热土，我希望我自己退休以后还能继续关注中国的变革、研究中国的变革！

王洛忠：谢谢您，怀特教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时间接受我的访谈；同时也感谢您与中国学术界的密切合作与频繁交流，感谢您对中国留学生的悉心指导与无私帮助；更感谢您对中国 30 年改革与发展的密切关注与理解、支持！

马丁·怀特：也要谢谢你！整理访谈记录会很辛苦的！有问题我们再联系！祝你在哈佛大学访学愉快！

(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安卫华参与了前期部分工作；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生张瑞燕参与了部分文稿的翻译和资料整理工作，特此致谢！)